

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一生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级中学。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泽东，让他学习清代史学著作《通鉴辑览》，这让毛泽东开始更系统地学习中国正史，也为他之后研读《资治通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开始研读《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智慧。多年以后，投身革命的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减，无论行军、吃饭，还是扎营的时候，即使生病卧床，他也手不释卷。同时，毛泽东为提高军队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文化水平，还号召全党对历史进行学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对历史研究的重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无不钦佩地评价毛泽东：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在他晚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阅得“支离破碎”，只得用透明胶“缝缝补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反复研究、批注、阅读了17遍之多。

从《资治通鉴》中获得历史经验

毛泽东反复研究学习《资治通鉴》，从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更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北宋时期，中国已

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变迁，司马光“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近20年的努力编纂了《资治通鉴》。他的封建专制视角中，也带有民本史观的先进性。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因此，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举《资治通鉴》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段话来论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说：这段话“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中的辩证法内涵，也是毛泽东重点研究的内容。他曾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发现《资治通鉴》的治学特点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军事内容多，经济文化的内容少。关于这个特点，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

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 陈 思

核心阅读

北宋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世经典。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同时，毛泽东重视《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物史观。

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

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资治通鉴》记叙并剖析了1362年的历史，其始与终都有讲究。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上梁不正下梁

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在，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资治通鉴》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认为：“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唯物史观演进与中国传统回溯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革命实践的历练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但他同时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读过《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书籍。在这之后，梁启超等人的史学思想，使毛泽东又受到资产阶级进化史的影响。但是，对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的危亡，民族的未来要往何处去，毛泽东在当时的知识结构中找不到答案。

五四运动以后，以无产阶级主导的阶级联合逐渐形成，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他的政治信仰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0年初，毛泽东开始组织安源、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并开始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革命实践。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系统精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自此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再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黄炎培：“读书有三想”

□ 王凤青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卓越的、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他曾指出：“读书有三想：一、想我为什么读书？二、想这书该怎样读法？三、读了以后想比未读时怎样？”这一理念贯穿在他的整个读书生涯中，也为后人思考为何读书、怎样读书及读书后有何收获，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为什么读书？

黄炎培出生于1878年，正是清朝政治腐败没落、列强入侵、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促使他悉心研读古今中外的各种救国安邦学说，并确定了读书的目标。

为多数的民众。黄炎培曾指出：“吾思想、吾行为，都归宿于一点，即如何造福公众是也。”他还指出：“做事必求心安，求安必须爱民。”黄炎培出身于中下层的读书人家，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目睹了下层民众的苦难，对广大民众产生了同情，也使他立下了读书要为多数民众谋幸福的志向。

为整个的国家。黄炎培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因有人戏谑说中国不是他黄炎培一人的、不必焦心忧虑时，他大怒，哭叫道：“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儿子黄万里在赴美留学前夕，他特意嘱咐：“学自外国，勿忘用在中国。”他认为读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救国，“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字，所做的事情，以及奔走各地的目的”，“全不离这个原则”。

书怎样读法？

黄炎培曾指出，“读书有法，不得其法，则始而欣然，久而厌倦，且于实际上上不易得益，读如未读耳”。他在读书时注意思考总结，形成了一套非常实用的读书方法。

作提要记录大概。黄炎培认为：“凡读书提要记录大概，可以得极大帮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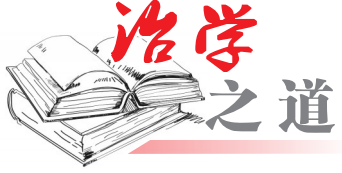


比未读时怎样？

黄炎培一生著作颇丰，他注重“经世致用”，将读书的感悟运用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面。

分析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通过读书，黄炎培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强敌压境、中华民族遭受亡国危险空前严重之际，他通过研究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在其所著的《中华复兴十讲》中指出，中国抗战的形势虽然非常艰险，但只要全体国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把个人的聪明才智陶铸成统一的力量，中华民族就可以“从死里求生”，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

思考总结历史经验教训。1945年6月底7月初访问延安时，黄炎培曾与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窑洞”对话。在交谈过程中，他问了毛泽东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这也是他在读书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黄炎培显然是非常满意的，这也使他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影响到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刊策划以“全面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为题，围绕年轻干部如何加强理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锤炼品质修养等问题邀请专家学者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撰文探讨。

年轻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在《年轻干部要把加强理论修养作为一生的追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年轻干部要把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作为一生的追求。他认为，年轻干部是在认识世界（事物）、谋划事业和工作、改造世界并做好工作的进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因此可以从认识世界、谋划事业和改造世界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年轻干部的成长为何需要并如何加强理论修养。

坚定理想信念是党员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在《坚定理想信念是年轻干部的立身为政之基》一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一次对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年轻干部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文章强调，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对党忠诚，永葆政治本色。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关键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统领干部思想境界的根本问题。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皆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始终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宋福范在《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一文中认为，年轻干部锻炼成长特别是提升思想境界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锤炼品质修养。年轻干部重视锤炼品质修养不仅关乎干部个人成长和成才，关乎党风政风社风，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党政研究所所长丁俊萍等在《年轻干部如何上好锤炼品质修养这堂“必修课”》一文中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年轻干部必须始终把锤炼个人品质修养作为必修课，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实践历练和坚持慎独慎微来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关乎党和国家命运。彦德等撰写的《着力培养选拔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优秀年轻干部》一文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我们站在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高度，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效的举措，及早发现、及时培养、源源不断选拔使用政治过硬、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要牢牢把握目标要求，以大力发现储备为基础，以着力培养锻炼为重点，以确保选准用好为根本，以从严管理监督为保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充足干部储备和人才保证。

对于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落到实处，促进年轻干部成长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何懿认为，总书记的讲话从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年轻干部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根本要求，广大年轻干部必须深入领会、牢牢坚持、认真践行。中

从这时起，毛泽东早年受儒家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历史观，发生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之后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理念，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全新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未失去其宝贵的价值。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从研读《资治通鉴》到《阶级斗争》再到《社会主义史》直至唯物史观趋于成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不是单行道，而是一条汇聚涓流的大河。他的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跨越了时空与阶级等界限，将不同思想的光芒兼收并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研究800多年前司马光以封建统治者视角所系统记述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他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让唯物史观自此具有了堂皇的中国气派。



全面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4期聚焦

□ 范丽君

青一班学员来颖杰认为，要把“真”字写在年轻干部心中，贯穿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年轻干部要做到理论学习上的“认真”，信念宗旨上的“本真”，作风作为上的“求真”，修身立德上的“纯真”。社科班学员王叶臣认为，加强年轻干部的理论武装工作是一件大事，既要立足长远，也要立足当前，尤其要科学把握好用什么理论武装、怎么武装、理论武装成果怎么用以及理论武装工作谁来抓的问题。